

书林漫步

新书纵览

二蓝诗风：一手兼备众体

□王志阳 文/图



在《蓝山集》中也存有《题程芳远〈游方卷〉》，可知二蓝的交流圈具有高度重合的特征，使得他们的诗歌内容和诗歌风格呈现相似的特征。

《明史》本传寥寥片语，语焉不详。关于蓝仁、蓝智四库馆臣提要《蓝山集》说：“集中有《甲寅仲冬摄官》诗，甲寅为洪武七年（1374年），则放归又尝仕官，特其始末不可考耳。”此诗现存于明嘉靖本《蓝山集》卷五，其诗题：“甲寅仲冬，予摄官星渚，本邑判簿李公以催租入山，忽游武夷。予命小舟追之，不及。是夕，宿庵麓。溪风山月，一时清兴。王事靡盬，明日即附舟逆流而上。因忆囊时与石堂卢使君同游，放怀山水，一觞一咏，其乐不可复也。援笔书怀，遂成唐律二首。”则蓝仁在洪武七年曾出任崇安星渚代理官员。蓝仁在元末出任武夷书院院长，又于

明初出任职位更低的崇安星渚代理官员，反而拒绝更显赫的邵武尉（邵武在元末是邵武路），其原因无从可考。合理的解释是邵武尉之职需要蓝仁赴邵武任职，而另两职位在崇安县内而已。蓝仁接受任职不在意于官衔、职位高低，其对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蓝仁固守乡梓不同，蓝智则是远仕广西。张渠评价其：“持身廉正，处事平允，于今三载，始终不失，于吾道有光矣。”《明史》评价“著廉声”。至于其行政业绩，史料缺载，但有两点理由可证其兢兢业业为国作贡献：

其一是探索治理广西的有效方法，如《忻城公馆》有云：“俾之知逆顺，责在任民社。慎勿示姑息，善政资陶冶。”表明蓝智总结了广西社会治理的两条原则：一是依托当地乡绅的社会力量；二是推行宽严并济政策。这本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明朝对当地社会的治理并促进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

其二是病逝于任所。虽有四库馆臣推断“晚年又尝谢事归里矣”，但是张渠说：“客役他乡，不永天年者，不幸也。”时人蒋易作序也曰：“辛亥冬……子泽自桂林回，附稿见示。明年秋，其方外友上清程芳远来索稿，欲类成集刻而传之，且证为序。”蓝智《书怀》十首寄示小儿泽有言：“我今去汝远，微宦极南荒……愿汝学古人，黽勉耕与桑。”表明其子泽居于武夷山。其末有张渠按语：“不远数千里作此诗，令其官属楷书以寄其子，忠孝之道两尽之矣。”那么，蒋易所述蓝智辛亥冬从桂林返回武夷山，而程芳远在次年刊刻遗文《蓝山集》，则蓝智桂林之行当是为蓝智扶棺而回之事。

关于二蓝对中国诗歌史的影响，朱彝尊的评价最中肯，他在《静志居诗话》卷四“蓝仁”条说：“二蓝学文于武夷杜清碧，学诗于四明任松萝，其体格专法唐人，间入中晚。盖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

这条评价被广泛接受，如藏书家李善生将其抄录于明嘉靖刻本《蓝山集》首页，四库馆臣亦引述其观点，只是局限于评点和书目文献体例，尚未详述其成就。

作为闽中诗派的导源者，二蓝诗歌成就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崇安二蓝作诗以盛唐为法，推尊杜甫又理性学杜。蓝仁《咏竹》说：“占竹不妨随杜甫，杖藜还许似陶潜。”《简张判簿》其二说：“溪上骑驴思杜甫，道边留犊问时公。”《寄张兼善》有云：“闲向草堂寻杜甫，百年地僻有柴门。”蓝智《莫春奉怀李葛二先生》则说：“仲舒经术传三策，杜甫文章跨数公。”《寄刘典筌》说：“溪上浣花逢杜甫，洞中采药忆刘晨。”亦与其兄无异。但是和前人一味推崇杜诗不同，二蓝对杜诗存有保留意见，如蓝仁《次天石上人韵》说：“浣溪杜甫贫尤甚，破屋庐全懒是真。”《寄汪雪堂》说：“杜甫只将诗送老，陶潜真与酒忘形。”蓝智《寄程伯来教授》则说：“久知杜甫诗徒苦，应笑扬雄赋未工。”

二是作诗兼具现实与浪漫风格。蓝仁不仅有《寄示侄泽》《寄明之弟》等写实作品，也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作品，如七言长篇《酬刘兰室题墨菊扇寄意》虽是题扇诗，却妙笔生花：“苏仙笔下云雾湿，刘侯句里烟霞清。”蓝智亦如出一辙，如有《书怀》十首寄示小儿泽等充满真挚情感的写实作品，也有从北京到广西任上所写《宿浣湖十八韵》《八月廿三日溯大江遇风而作》《过安城怀故元师余阙遗心》《庐山》等纪行诗，还有《题林士衡所画揭士方壶歌图并寄葛原哲经历》等歌行体作品，如“谪仙何处驾长鲸，杜甫空歌拾瑤草”，自有想落天外之浪漫之风。

正因如此，张昶评价说：“其古仿佛魏晋，其律似盛唐，长句则豪健，五言则温雅，拟杜似杜，效韦似韦，何其一手兼备众体。”虽评蓝智之诗，亦正可符合二蓝诗风特征。（作者单位：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日常的深处》

王小伟 著 中信出版社



为什么柴火灶比煤气灶烧菜更香？为什么自行车比汽车似乎更能承载？为什么炉子比暖气更温暖人心？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今天，人们时常为外物所累，“想”回到相对贫乏的过去，重回人与物的和谐关系。这种对过去生活的罗曼蒂克的想法值得玩味。作者从怀旧的影像中梳理内心，透过自身的经历和长辈的回忆，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技术人工物（俗称“东西”）是如何生灭的，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物件是如此珍贵，仿佛家庭成员，而现在的物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只剩下干瘪的使用价值。作者以技术哲学为基，打破学术和文学的壁垒，把物件当成主角，刻画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集体历史。

《一人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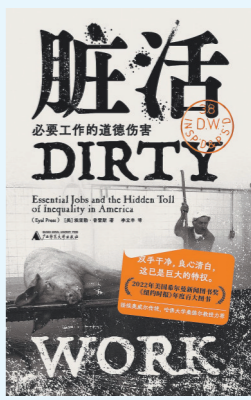
卡丽·莱恩 著 李磊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不稳定时代来临时，我们如何应对失业后的事业与生活？通过18个月的田野调查、9年的跟踪采访，与400多位高新技术行业的失业者的深入交流，作者深刻呈现了这群失业者的遭遇，并挖掘出隐藏在群体背后的生存哲学——“一人公司”：在精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白领很少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制度”或雇主，而是倾向于责怪自己，或将失业视为全球经济中商业周期和竞争的必然结果。由此，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临时的，不再存在职业忠诚，个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当作一家“一人公司”来经营。他们小心经营着自己的“一人公司”。然而，当泡沫破灭，将一切寄托于自己的努力，还是唯一的出路吗？

《脏活》

埃亚勒·普雷斯 著 李立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如屠宰场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着道德成本的真相。

《无地可依》

克里斯蒂娜·J·沃利 著 张伊铭 译 三联书店



1980年，14岁的克里斯蒂娜·J·沃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所在的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厂突然倒闭，接下来的几年里，近10万附近的居民也将失去工作。30年后，沃利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她在《无地可依》中把人类学视角带回家，审视自己的家庭和整个美国蓝领阶层的命运，对“去工业化”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在其精辟的分析中，每个读者都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什么向上流动从集体性转向个人化，以及哪些政策错误导致了这种困境。

读李阳冰“般若台铭”

□陈常飞

尚，而曾不省其根本，由是篆学中废。”

虽然篆书仍存续在一些载体中，比方说碑额、且贞观以后“明书科”学生留意《说文解字》《字林》等著作，当时也不乏精研文字者，但其所留意并不关注篆书笔法，而字学一门情况亦不乐观。这样的现象至李阳冰始为一变，“致使秦代篆体至中唐而复兴”，这是他对唐代书法发展的贡献。

李阳冰当年精研字学，“虔诚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万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祝嘉《书学史》》）此精勤态度，也是后者效法的榜样。

关于李阳冰对篆书的见解，《墨藪》载李阳冰《论篆》云：“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无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豎同堂，李丞相持束为束，亦鱼鲁一惑，涇渭同流，在当年‘书法图’中也不是主流。宋朱长文《续书断》说：“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唯真草是攻，穷英擢华，浮功相

理解作“未隶斯文”，即是以“篆籀”作为“文化传统”象征。

乌山上这段摩崖石刻，后人皆对之评价甚高。有一种说法是“般若台铭”与处州《新罗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并称天下四绝；清周亮工誉其为“人间至宝”；近代康有为也推崇道：“篆书大者唯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端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

对之赋诗发表感受、赞叹者更代不乏人。曹学佺《华严院观李阳冰篆刻》诗云：“当涂称四绝，岩顶迹荒荒。虽勤唐人笔，实为秦代书。完全无斧凿，密尔有禅居。珍重山灵意，宁愁鲜剩余。”

黄任钟爱碑版金石、摩崖文字，留下诗歌多篇，其《李阳冰般若台篆字歌》文笔跌宕，首先描摹这段摩崖石刻整体气势，用华丽辞藻极力铺陈，接着以简练的语言描写了“石鼓文”“鸣嶂碑”“峰山碑”“之果山秦篆遗文”“六国文字及史籀、李斯、许慎这些

在书法发展进程上的重要人物。他高度肯定李阳冰篆书成就，认为其代表作《三坟记》重于鼎彝，更叹李氏书帖难以求购。进而描摹其石刻文字，将李阳冰的“玉箸篆”比作缠绕纠结之蛟龙。又论其笔画如“折钗股”一般，给人坚韧有力的感觉。更用虞世南“恒手画肚”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李氏篆书心摹手追、犹恐不及的心情。

观李阳冰书作，可见其书风风采，也印证了一句话：“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研究中国书法史，李阳冰是绕不开的人物。学习书法者，其书作也很值得临习。但关于这段摩崖石刻的来历，文字所存不多。郭柏苍《乌山志》云：“昔有沙门持《般若经》于此不释手，因名。唐大历七年，李贡造台，李阳冰篆记……镌若上。”这道出了命名“般若台”的原因。但李阳冰可能并没有来过福州，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载：“李阳冰足迹未至福州，此殆从他处所书寄来。”

为福建漆艺史理论研究“补白”

□黄建兴

曾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齐名的福建脱胎漆器，在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长廊中曾经留下一串耀眼的印记。以清代沈绍安脱胎漆器为代表的福建传统漆器，器形多样，制作精良，髹饰华美，色彩绚丽，几百年来享誉中外，令人爱不释手。与传统漆器伴生的还有诸如漆线雕、金漆木雕、漆篮、漆筷以及漆画等众多漆艺类作品，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然而，在漆艺理论研究领域，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传统漆艺所具有的专业特性而存在较高的研究难度，以至长期以来在福建漆艺史研究方面不尽如人意，未见一本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专著问世。祖籍福州的现代著名文物鉴赏家和学者王世襄先生生前曾经感叹道，真心希望今后有人能够写出一本系统研究论述福建漆艺史的专著。

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福建传统漆艺》，全书达40余万字。该书以诸多历史文献、现代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结合宋元至近现代福建各地漆器等实物及其制作工艺与髹饰技法，继而以福建地区

战国秦汉墓葬出现的漆器、宋代福州制作的剔犀漆器、清乾隆年间沈绍安溯古复原“红胎”工艺技法制作的脱胎漆器以及近现代福建漆器不断发展壮大等历史脉络为纲要，对福建传统漆艺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填补了福建漆艺史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

林蔚文教授所著的《福建传统漆艺》，通过现代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考证，将福建漆器出现的历史提前到战国秦汉时期。同时，对福建传统漆器的胎体制作、髹饰技法、装饰图案纹样与器形分类，以及漆线雕、金漆木雕、漆画、漆篮等诸多专项内容都分别做了专门论述。

关于福建古代漆器种植问题，目前在国内漆艺界的有关理论著述中，尚未见到相关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福建传统漆艺》公布10余条古籍方志记载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首次证实福建古代漆器种植的历史事实，从而填补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空白。

有关清代沈绍安脱胎漆器的溯源问题，是福建漆艺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学术理论问题，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该书通过各种有说服力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论证红胎与木胎、夹

红胎的不同之处，进而认为福州脱胎漆器源于古代的“红胎”。清代漆艺巨匠沈绍安研制的脱胎漆器，当是溯古复原秦汉时期的“红胎”工艺技法，但在制作技法等方面又有拓展创新，在中国古代漆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该书对近代福州漆器制作中心的福州漆器行业50多个重要厂家、商号或店铺的经营情况进行细致的论述，对包括店主、店号、创办年代、具体地址、资金及雇工人数等分别做了列表统计。在此基础上，对近代福州漆器产业发展的若干特点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这本书不是就艺术谈艺术，而是把福建漆艺放到历史文化的大平台和大背景上去展现和论述。

该书对明清近代福建民间广泛流传的金漆木雕做了专题论述，首次发表一批精美的金漆木雕照片，同时进行详细的图文解读。500余张多方搜集的精美照片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如对于传统漆枕、漆筷等小类漆器的论述较为简略一些，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福建传统漆艺》是一部站位颇高的理论研究专著。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书点击

